

俯 视 经 济 · 直 面 社 会 · 薪 传 学 术 · 关 注 中 国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a:

Voices from Economists

中国的大国发展之道 ——来自经济学的声音

★★★★

王永钦 张晏 章元 陈钊 陆铭 / 著

53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China:

Voices from Economists

王永钦 张晏 章元 陈钊 陆铭 / 著

中国的大国发展之道

——来自经济学的声音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的大国发展之道:来自经济学的声音/王永钦等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ISBN 7-208-06584-5

I. 中... II. 王... III. 经济学—中国—文集
IV. F120.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23231 号

责任编辑 李 娜
封面设计 人马艺术设计工作室·储平

中国的大国发展之道

——来自经济学的声音

王永钦 张 晏 章 元 陈 钊 陆 铭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高等教育图书公司
www.hibooks.cn
世纪出版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24 层 021-63914988)

发 行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 张 21
插 页 4
字 数 296,000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08-06584-5/F·1498
定 价 30.00 元

中国的大国发展之道——来自经济学的声音

“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是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王永钦、张晏、章元、陈钊和陆铭五位青年经济学者发起成立的。这个工作室的目标是为了交流和研讨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成果，并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式理解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工作室将特别注重经济学与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相互借鉴，以及对当代经济学实证研究的追踪。工作室将不定期地以小范围研讨的方式推动现代经济学研究成果的传播和自身研究的交流，并以对话的形式结合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来理解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重大问题。

前 言

经济学因为关注人类行为,关注制度和市场机制的运行,关注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俯视经济”和“直面社会”的位置。

我们因为有了经济学,有了对于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问题的思考,而肩负起了“薪传学术”和“关注中国”的责任。

我们带着经济学的知识,我们迎来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智慧。我们相互地提问和对话,我们记录下那些只言片语。我们团团围坐在一起,中间有着火焰的温度和光亮。

我们沉静下来,我们用自己的阅读织成一张巨大的网。我们努力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经济学因为思考着现实世界而有了生命,思考因为有了经济学而有了力量。

让我们站在中国的土地上,让我们共享学术的喜悦与激情。

目 录

___ 1	前言
___ 1	1. 转型的困惑 ——重大的问题与挑战
___ 22	2. 中国分权式改革的成本与收益 ——兼论政府和公用事业的改革
___ 47	3. 中国经济转型中的 power 与社会结构
___ 81	4.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身份、价值与认同
___ 108	5. 反思中国的教育 ——社会流动和平等的视角
___ 133	6. 收入分配、社会结构和经济增长
___ 144	7. 企业产权的政治重构： 一个历史的视角
___ 169	8. 中国国家建设走向何方： 一个政治经济的视角

___ 194	9. 增长重于制度： 社会与政治转型的经济学思考
___ 216	10. 经济学与当代中国 ——在复旦大学第十届经院人节开幕式上的演讲
___ 242	11. 转型中国 ——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
___ 320	后记一：共享学术的喜悦与激情 ——复旦的一个青年经济学人群体
___ 324	后记二：我们生长在中国的土地
___ 328	后记三

1. 转型的困惑

——重大的问题与挑战

主讲人:章元 张晏 王永钦 陆铭

主 持:陆铭

整 理:胡霄俊

时 间:2005 年 12 月 20 日

地 点: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2 号会议室

【陆 铭】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讨论的背景。在最近的几个月里,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我们成立了一个工作室,叫做“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这个工作室有五位成员,分别是张晏、章元、王永钦、陈钊和我。这个工作室的成立有这样几个意图,首先我们觉得,在现在的中国,大家谈到很多经济学的问题,或者跟经济学有关的问题的时候,实际上都不是特别了解现在经济学研究当中一些比较新的文献。

我们首先想做的是科普性质的工作,让大家来了解经济学的研究进展到什么样的程度,来帮助我们去理解一些现实的问题。第二个意图,也是我们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促进我们自己的研究,经过这个学期的讨论以后,我想我们也确实达到这个目

的了。待会儿我还会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以后在研究当中想做的一些事情。第三,就是我们发现现在跟中国问题有关的研究里面,对于中国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重视得非常不够。所以我们这个工作室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旨,就是想推动大家去认识一些跟中国经济学问题特别有关系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想引起对这方面问题的关注,其中我们又特别重视关于中国经济的实证研究,所以大家可能会看到我们讨论了不少实证研究的东西。同时,我们也想促成一些跨学科的交流,这个学期组织了两次活动,一次是政治学的,一次是社会学的。在我们的一系列讨论当中,涉及的主题与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的联系比较紧密,而且是非常重大的问题。今天的这个活动有这样的意图,就是把我們最近的所有这些讨论做一个总结,同时在我们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一些问题,供大家一起在未来思考。今天我们给这个讨论起了一个题目,叫“转型的困惑——重大的问题与挑战”。问题基本上集中在我们已经讨论到的一些问题,之后我们再提出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和有待思考的问题,作为“挑战”,来给同学们包括我们自己提出思考的方向。接下来我们就请王永钦、张晏、章元这三位来做他们各自的总结,特别是章元前段时间在国外,刚刚回来,前段时间工作室的讨论,他一直是通过网上来跟我们互动的,他今天也是头一次亲自跟我们讲讲他的一些看法,完了以后我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他们三位各自的研究领域大家也比较熟悉,王永钦主要是研究合约理论,章元主要是研究农村经济,最近特别是在做一些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张晏主要是做公共经济学,特别是在做财政分权方面的研究。今年九月份的时候,在校庆前后我们学院推出了一套书“复旦大学青年经济学者文库”,他们三位也是这套书的三位作者,他们可能也会谈到跟书的内容有关系的一些东西。下面就请他们三位来讲。

【章元】 我从芬兰回来的第二天,就在凤凰卫视里的《文涛拍岸》这

个节目里看到一个发生在中国的很凄惨的故事，讲述的是在浙江台州打工的一家三口，母亲忽然得了脑溢血，父亲和女儿凑了几万元钱把她送进医院，后来钱差不多快用完了，就剩了几千元钱，尽管人还没有死，医生认为已经没有救了，而且他们再也无法借到钱来支付昂贵的医药费。他们就想，既然这样下去病治不好又没有钱，就干脆把这点钱省下来，作为母亲死后的安葬费，以免人死了连安葬的钱都没有。于是女儿就叫了一辆“120”把母亲往回拉，结果走到半路上，房东打电话来说不允许他们把病人拉回来，说将要死的人不能运到屋子里面，这样她母亲就回不去了。而且他们的老家又不在浙江，左右为难了很久，最后说服了“120”直接把母亲送到火葬场去。《文涛拍岸》中讲述的情节很离奇，虽然这个人没死，但是他们也许以为她已经死了，也许以为她即将要死去，送到火葬场也就没什么事了。最后他们也确实把母亲送到了火葬场，但是，火葬场的工作人员正要给她穿寿衣推进火化炉的时候，有一个工作人员忽然发现这人的手还在动，而且眼角里面流出了泪水，也就是说，差点把一个大活人推进了火化炉。这就是《文涛拍案》里讲述的发生在中国的活生生的案例，当然这只是比较极端的个别事例。

我今天给大家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希望大家来关心这个社会，关注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你们可能没有想到，在中国经济增长引人注目的同时，却还有这么凄惨的故事在发生，这显然不应该是在一个和谐社会里所看到的现象。我刚刚讲的这个故事，实际上说明了很多问题，比如说明了中国农村没有建立起一个社会保障体系，如果一个城市人将死的时候，公费医疗可能已经对他有所保障。这就涉及我今天要讲的主题——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

最近几年，世界各国的很多经济学家都在关注和研究中国的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贫困和收入差距这两个问题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贫困是一种绝对的贫困，收入差距是一种相对的

贫困。当我们所有的经济研究者在关注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并研究它们的影响因素的时候,在我们关注市场化、城市化、中国加入 WTO 等各种经济因素对收入差距和贫困影响的同时,我觉得我们忽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城市倾向政策对这两个问题的影响。追述一下历史,我们的城市倾向政策首先就体现在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上。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是个老话题了。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苏联已经掀起过争论的热潮,但是在中国这个问题似乎被大家忽视了,至少我认为当我们现在来思考收入差距扩大和农村贫困问题的时候,这也许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个问题牵扯到很多方面,如户籍制度,这些方面都是有历史渊源的。这个渊源其实很简单,我们在建国以后学苏联的模式。建国之初,我们是个穷国,要搞工业化,就需要有资源,但由于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在得不到外援或不能仅仅依靠外援时,于是就学习苏联实行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这是由苏联一个经济学家提出的发展策略。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可以控制一切,可以控制价格、控制生产,所以政府可以把农产品的价格比如粮食的价格,通过计划机制定得很低,这样就导致生产利润流向工业部门,导致工业的大量积累,以牺牲农业利益来支持工业的发展,从而可以走工业化道路。这里的道理很明显,农产品价格降低,会导致工业的生产成本降低,然后又可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控制工业产品的价格,这样通过国家把大量的利润积累起来,就可以有大量资本投资于工业化。

国外经济学家一直努力解释所谓的“中国之谜”,也就是要解释为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能够保持长期的快速增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别的发展中国家也在搞改革开放,为什么中国却能保持那么好的经济增长绩效?包括现在我们所提出的“出口导向”的经济表现这么良好,实际上背后依然是农业对工业的支持所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经济启动的早期,要是没有这个价

格剪刀差,没有农村对城市的支持,中国经济怎么可能有今天这么迅速的增长呢。

我们现在且不去关注这个由于历史原因导致的剪刀差,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关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差距的扩大。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收入差距过大的社会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当初实行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是为了发展生产力,为了国家的工业化,为了整个国家的命运,但是我们现在发现城市倾向政策还在持续进行,影响还是很大。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都投入到城市,而投入到农村的却很少,还有教育、医疗、住房等,大量资源都在向城市集中。在没有实行市场化改革之前,只要有城市户口,就有一个社会保障,就能够享受这个保障,但是农村人却享受不了这个待遇。与这些方面的城市倾向政策相配套的就是中国的户籍制度,户籍的影响并不仅仅是限制劳动力的流动,实际上是整个城市倾向政策体系里面非常关键的一环,因为政府制定了对城市人更好的政策,比如说住房补贴、社会保障等一系列的东西,农村居民也想得到这些,但是由于没有城市户籍,就无法享受这些东西,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配套的强制措施。

我们可以感觉到,对于中国现在的收入差距扩大以及贫困问题,城市倾向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这种倾向政策可能包含了不公正,从而导致了结果的不平等。比如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前中国高考是一张卷子,但是各省市由于被给定了录取的名额,从而就有了不同的录取分数线,这个政策是一种社会的倒退,是一种不公正,一种程序上的不公正。既然大家都是相同的学生,考了相同的卷子,为什么大城市里的学生就可以以更低的分数被大学录取呢?为什么高等教育的资源能够更多地被大城市的学生享用而不是被公平地享用?高等教育的经费来自于国家税收,不只是由大城市的市民缴纳的。即使有些高校接受了地方财政的支持,但是其得到的支持与其在

招生上的倾斜是不成比例的。后来各省使用了不同的高考试卷,现在各省之间的高考分数就没有了可比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为什么有这个政策产生?对不同省份的考生采用不同的尺度去衡量他们,其科学性体现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以前同一张卷子,现在变成不同的卷子呢?很明显,这实际上是城市倾向政策所致。

现在大家之所以如此关注收入差距问题,是因为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中国就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就会导致很多问题,比如缺乏中产阶层。没有中产阶层,这个社会就缺少社会资本,而这种社会资本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收入差距过大,还会导致缺乏好的公共政策的制定,还可能会继续扩大收入差距。这就是中国现行体制里面的 power,这种社会结构会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嵌入到市场体制之中,会加剧这种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所以我们关心这些问题。收入差距过大还可能导致其他问题,比如说市场保护、贸易保护、社会分割,等等。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城市里面穷人和穷人在一起,富人和富人在一起的现象,这就是一种社会分割。由于不平等而导致的收入差距会产生很多对经济增长不利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关注收入差距和贫困问题。

当然,城市倾向政策不仅仅对收入差距及贫困有重要影响,它还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例如我最近读到杨涛与蔡昉的一篇工作论文,他们的研究认为,中国的城市倾向政策使中国在获得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例如产业结构偏离了根据比较优势决定的结构,从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以及由经理对工人的低激励而导致的技术低效率等。这些教训告诉我们,在中国流行的经济理论及实践可能并不能带来国家整体的发展和全体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

所有这些问题对于思考中国的未来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天上午的“中国经济竞争力研究基地”的成立大会上,黄有光

教授举了关于中国的两个数字：我们国内厂商生产一台 DVD 的利润只有一块钱，生产一个 MP3 的利润只有一块五！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外贸增长得很快，GDP 增长得很快，如果要算 GNP 的话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然而现在更关键的问题是要思考更长远的未来，中国那么多农民，特别是教育、医疗等公共产品倾向于城市，农民如果得不到良好的基础教育，一代一代复制下去，将来中国怎么发展？为什么现在我们制造一台 DVD 只能赚一块钱？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技术，大规模的技术进步只能来自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只能来自于良好的国民教育。所以我觉得我在这里之所以提出城市倾向政策问题，是因为目前中国的发展提出了这样一个挑战：我们是否还要维持这个城市倾向政策？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个政策导致的低效率，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逐步有效地消除这种低效率？如果我们希望中国的未来经济有一个良好的发展，我们应该做什么？这是摆在大家面前需要思考的大问题。

【张 晏】 章元主要是从政策角度分析中国的贫困和收入分配问题。政策的背后还有大量相关联的因素，比如说各级财政的安排，今天我们把大题目定为“Puzzles of Transition—Great Challenges and Issues”，那么我主要还是从政治和财政分权的角度来谈目前我们关心的一些问题。

一两个月前，在关于 power 的那次讨论活动中，我已经谈到了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财政体制对于目前转型经济发展的一些影响，主要的结论在我们的整理稿中。那次我们更多地从政治角度去看问题，而且更多地讲的是一些积极的作用，中国的政绩考核机制、中国的权力结构特点造成的结果就是中国存在着一种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 (yardstick competition)，而这样的一种标尺竞争是有助于经济增长、有助于在转型初期社会资源的配置的，我们主要是从积极的效应上去看的。当时我们也举了很多

案例,比如城市化、乡镇负债的问题,但是都没有深入展开,今天我想更主要地谈另一个侧面的问题,讨论中国目前这样一种权力结构所衍生的政治竞争,包括以权力结构为背景的财政体制安排本身的一些负面的、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这也更能切合我们所说的“重大的问题与挑战”这样的话题。

那么从什么角度开始谈呢?我们还是基于文献。昨晚 11 时 45 分,我收到了邹恒甫老师的邮件,他发给我几篇工作论文,我看到凌晨 1 点多。今天早上他打来电话说,他感觉目前别人对公共财政问题的研究已经超越了他那个时代。我们通常讲分税制改革以来的财政体制安排是更不利于穷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税收返还基数法,富的地方会得到更多的税收返还。那么像这样一种财政体制的安排会不会加剧地区差距、会不会导致地区间的收入不平等和城乡差距呢?这几篇文章采用了新的视角,用全国 2 000 多个县 1993 年以来的财政收支明细数据,对县级的基尼系数进行分解,看财政分权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大小。这些数据是非常珍贵的,采用的方法也不错,所以连邹老师都有这么强的紧迫感,说他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如果地方之间是标尺竞争的话,也许我们可以看到的一种现象是大家都会向好的目标靠拢。但是蔡洪滨在 2005 年最近一期《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文章说,这种标尺竞争的结果除了集聚均衡之外,还有分离均衡,就是说富的地方可能会更富,穷的地方可能更穷,好的地方都会向好的标准去看齐,而穷的地方就破罐子破摔。那么,我们目前的政治和财政体制安排对于地区间收入不均等的影响,恐怕就不完全是我们前面所说的自上而下的标尺竞争所带来的积极的正面的作用。我今天想说的第一个问题总结起来就是,我们需要实证地看一看我们的政治竞争、财政竞争是不是促进了经济增长,是不是促进了社会公平,而财政差异导致的地区差距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视角。这个问题的研究恐怕才刚刚开始,前面说的研究之所以

能做出来是因为他们有数据,要拿到这个数据有点困难,但至少已经打开了一扇窗户,我们要分析清楚这个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想接着说的第二点是,如果我们真的达到了分离均衡,而不是大家都向好的地方——标尺——去看齐的话,这会产生怎样的后果。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深入探究一下,财政体制的背后还有什么问题。其实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政治竞争,首先财政问题和政治问题是不能分开的,其次中国目前的财政体系背后恐怕已经有大量的权力结构和大量的政治竞争在推动,并且导致了地区间的差异等结果。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从以前了解的一些转移支付的案例以及20世纪90年代初财政改革的例子,不难发现富的地方有更高的谈判力。如果真的像周黎安和李宏彬的文章所说的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有更高的升迁概率的话,那么有更高的升迁概率的人手中又拥有更高的权力,这种权力又可以进一步地被用来照顾当地的经济发展政策。如果是这样一种背景的话,我们要问,这种政治竞争赋予的财政体制结构的一些特点是不是会进一步加剧地区间差距?如果去看一下我们的财政税收政策,和财政税收政策背后那些表面上看不见的手——不论是政绩考核,还是政治竞争,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的确需要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

今天上午那个演讲中提到了“诸侯经济”这个词。那么马上联想到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标尺竞争是比较正面的,“诸侯经济”中大家都去向好的方面发展,会不会最终导致强强之间的过度竞争、强弱之间的竞争、地方和中央的竞争呢?这也可以从政治学的角度去看,比如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从这几年宏观调控的一些案例来看,这个问题引起经济学者的关注是很自然的事情。强强之间的竞争不奇怪,还要补充的一点是,弱的会不会进一步去拉强的后腿,反正他已经破罐子破摔了,很可能会采取一些经济上无效但是在政治上有利于自己的做